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中國李白研究

啓功題

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集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 .2003 ~ 2004/中国李白研究会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4.10
ISBN7 - 80707 - 067 - 6

I . 中… II . 中… III . ①李白(701 ~ 762)—文学研究—文集②李白(701 ~ 762)—人物研究—文集 IV . I 207.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4296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 千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 主 编：郁贤皓

■ 执行主编：李子龙

■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子龙 杨 明 余恕诚 郁贤皓

阎 琦 葛景春 詹福瑞 薛天纬

■ 编 校：殷春梅



目 录

试论李白隐逸活动的特征·····	任晓勇(1)
论李白个性与游仙的关系·····	李霜琴(15)
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有关问题·····	张涤云(27)
关于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主因的商榷·····	汤华泉(44)
李白谗逐说质疑赘论·····	张明非 李翰(50)
须教自我胸中出 切忌随人脚后行	
——李白对鲍照的学习继承与发扬论略·····	杨翔生(61)
《大鹏赋》为献贺知章而作说·····	阮堂明(77)
李白拜谒上书韩荆州时间考	
——兼述李白开元十八年入长安后之游踪·····	王伯奇(96)
《巴女词》当是李白少作·····	敬永谅(107)
唐代馆驿制度与李白馆驿诗·····	李德辉(114)
李白边塞诗诗体初探二题·····	海 滨(124)
李白的七言律诗·····	樊英民(135)
论李白诗歌的音乐特性·····	孟修祥(146)
李白诗歌及其现代解读·····	沈利华(159)
李白七首名著注释之误·····	武承权(170)
读李白诗文二题·····	奚渭明(180)
李白笔下的皖江风情·····	殷春梅(190)

中国李白研究

“银河”落自何处?	李士彪(206)
李白与孟浩然	蒋志(208)
五代对李白的接受	李艳婷(221)

唐汝询《唐诗解》“李白诗解”探论	王友胜 李德辉(233)
明人注李的典范之作	

——论胡震亨的《李诗通》	胡振龙(248)
论赵翼的李白研究	刘文刚(260)
陈振孙家藏本《李翰林集》源流补述	李子龙(271)
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概述	郁贤皓(276)

2003 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王友胜(283)
2002 年李白论著目录	韦兰 辑(292)
2003 年李白论著目录	韦兰 辑(315)

附录

在 2003 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郭慧民(327)
在 2003 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薛天纬(330)
2003 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	王尚义(332)
2003 年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葛景春(334)

试论李白隐逸活动的特征

任晓勇

(一)

隐逸思想和行为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相当突出的社会意识和现象,源远流长。隐逸是与仕宦相对而言的,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官吏政治,同时也就有了仕进与隐退的矛盾,有了隐逸思想的产生和遁世行为的出现。

入仕和退隐是中国古代文士两种常见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中国古代文学家作为文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与隐逸有着根深蒂固、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文学家中,盛唐时代的伟大诗人李白与隐逸的关系显得十分密切,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李白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非凡而又复杂的人生经历中,经常存在着仕进与隐退的心理矛盾和行为冲突;行藏出处的激烈斗争和艰难抉择困扰了诗人整整一生。隐逸像仕进一样深刻地影响了李白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他的隐逸问题加以专门的探讨。

然而,要探讨李白的隐逸问题却又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就现存有关史料记载看,李白的隐逸事迹似乎寥寥无几。据两《唐书》本传,李白的隐逸活动只有两三次:一次是出蜀前曾“隐岷

山”；一次是在东鲁与友人结为“竹溪六逸”同隐徂徕山；还有一次是与道士吴筠同隐越中。或许由于这样一种缘故，所以，在李白研究中，人们虽然经常提及诗人的隐逸活动问题，却都从未加以深究。即便偶有专门讨论李白隐逸问题的文章，也仅仅是认同上述史料中的说法^[1]。

但是，通览李白全集，我们会发现，其中表现隐逸思想和反映隐逸生活的作品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并且贯穿了诗人生平的各个阶段。那么，这样一来史料与作品之间就产生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呢？

这就触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李白一生的某个重要的社会身份和角色？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我们以供奉翰林一事为切入点来略加分析和说明。

天宝元年秋，李白应诏入京，供奉翰林，后遭谗被疏，三载春离京。李白把自己奉诏赴京的机遇总是说成倏起于江海山林，比如：“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子平，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恭承凤凰诏，倏起云萝中。”“我昔钓白龙，放龙溪水旁。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汉家天子驰四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上引分别见《秋夜独坐怀故山》、《东武吟》、《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李白初入禁中，玄宗是“如见绮皓”、“如见园、绮”（李阳冰《草堂集序》〔以下简称李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以下简称范碑〕）；遭谗被疏之后，则是“屡称东山”（李序），辞职时是“上疏请还旧山”、“恳求还山”（范碑、《新唐书》本传），玄宗批准时是“遂放归山”、“赐金归之”、“诏令归山”、“赐金放还”（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李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以下简称刘记〕、《新唐书》本传）。另

外,诗人也一再把自已出京以后的生活说成是归隐江海山林,比如:“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攀。”“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赠参寥子》、《酬崔侍御》、《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他有关文献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如:“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脱屣轩冕,释羁縻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浮游四方”(刘记、范碑、两《唐书》本传)。

上述情况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它实际上表明李白对自己一生的某个重要社会身份和角色有着比较自觉而清醒的认识。那么,这个重要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是什么呢?答案是比较明显的,即:隐逸名士!上面的有关材料还表明,其他唐宋时人也与李白本人有着相似的看法。范传正甚至还更明确地说过:李白“其生也,圣朝之高士;其往也,当涂之旅人”(范碑)。所谓“高士”^[2],与逸人、山人、幽人、处士、征士和隐士等几乎都是同义词。

我们说李白的一种重要社会身份和角色是“隐逸名士”,这既非无稽之谈,也不费解。李白在两《唐书》里虽然被列入“文苑传”和“文艺传”,但是他的生平事迹与《隐逸传》中的许多人是颇为相似的。或许,李白与“隐逸传”中的人们主要区别只是在于他的文学成就特别突出(两《唐书》的作者大概就是着眼于此,便把他纳入了“文苑传”和“文艺传”之中)。但是从历史上看,一个人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从来就不是与隐逸身份相互矛盾的。比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去世后,时人称他为“陶征士”(颜延之《陶征士诔》);“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宋书》更索性把他列入“隐逸传”。今天,我们把陶潜和李白列入文学史,称他们是伟大的诗人,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角色定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把他们都纳入隐逸之流又何尝不可。

既然李白是一位“隐逸名士”，那么，为什么古今论者对诗人的隐逸活动都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探讨呢？我想，可能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1）李白的生平本来就纷繁复杂、变化莫测，而他的作品一直难以妥当地加以编年，这就使得人们对他一生的生活行迹（比如隐逸活动）很难给予明晰的了解和准确完整的描述。（2）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李白的隐逸活动始终缺乏一种新的认知和把握方式。大家习惯于使用传统的隐士生活模式来框衡李白，而没有意识到李白的隐逸活动有着相当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李白与历史上一般的隐士生活作风是有很区别的。传统的隐士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定点而居、深居简出，甚至是岩居穴处、远离人世；他们的物质生活一般都很贫乏清苦，往往是蒲履葛巾、采薇食蕨。然而，李白则不同，他的隐逸活动除了与这种传统的隐士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外，还具有许多鲜明突出的时代特点和个人特色。换言之，李白所处的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个性使他的隐逸方式呈现出十分新颖的风格。

那么，李白的隐逸活动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

（二）

首先，李白的隐逸活动经常是与漫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李白自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提到李白的漫游，人们习惯于把它与诗人“遍干诸侯”、“力抵卿相”（《上安州裴长史书》）等干谒求仕活动相提并论，往往只看到或者只强调其政治功利性的一面，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事实上，李白的漫游常常具有很浓的隐逸成分，换句话说，漫游经常是诗人隐逸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大致说来，漫游包括旅行和社交两个方面的内容。相对而言，前者是漫游者与自然的联系，后者是漫游

者与社会的联系。我们不妨把前者叫做旅游,把后者叫做交游。当然,这两者有时是交错叠合在一起的。不管是在自然界的旅游中,还是在人世间的交游里,李白每每都有出尘之想和遁世之迹。在放浪江海徜徉山林之时,诗人往往是委顺造化、栖心方外;在接交簪绂宴饮宾朋之际,他又常常是忘情轩冕、心远尘俗的。这种隐逸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游隐”。

先看旅游之隐。李白在蜀中时,虽然长期隐居于大匡山,但他也经常出游,比如他曾到过著名的峨眉山,其《登峨眉山》诗云:“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徕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可见,诗人在周游登览之际心中充满了出世之情。

天宝元年春,李白曾有一次东岳泰山之游,诗人有《游泰山六首》记其事。其一云:“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其二云:“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扞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这组诗写得似虚似实,亦真亦幻,迷离惝恍,既有对泰山奇绝景象的欣赏陶醉,也有对神仙境界的企慕沉迷。如果把它与杜甫的《望岳》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杜诗所反映的只是一般的漫游活动,而李诗所表现的则是漫游与隐逸活动的结合,是典型的游隐生活。《唐宋诗醇》评论这组诗云:“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云尔。”意思是说,这组写景记游诗之所以充满游仙成分,是诗人借之而“寄兴”的缘故。那么,这个“兴”是什么呢?这就是皈依自然、栖心方外的隐逸情怀。

李白曾漫游越中。诗人于周流江海、登眺山峦之际,寄情自然,忘怀人世,学道求仙,希企高举远引。其《越中秋怀》诗云:“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爱此从冥搜,永怀临湍游。……何必

探禹穴，暂将归蓬秋。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天台晓望》云：“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筋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李白在漫游过程中，喜好广泛交往，与各类友人同游共隐，所以他的交游之隐比较多。据李白《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可知，他曾在江夏与蔡十交游。这位“蔡侯”与李白相似，也是在野文士。当时他正“周流宇宙”，而李白也在“遐穷冥搜”，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冥心道存”。他们“穷朝晚以作宴，驱烟霞以辅赏。朗笑明月，时眠落花。”分袂之际，李白还与其相约：“结游镜湖”，玩赏“耶川白云。”李白与蔡十的交往，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和世俗目的，这就是游隐生活。

在李白一生众多繁杂的交游中，有很多人是簪绂珪组之辈，诗人与他们的交往经常是一种干谒求仕行为，但是有时并没有功利目的和政治色彩，这也应当视为游隐活动。如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再次漫游江夏，他曾与张监丞交游。其《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云：“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挥斥幽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变，玉颜已缙，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微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谈玄赋诗，连兴数月，醉尽花柳，赏穷江山。……扬袂远别，何时归来？想洛阳之秋风，将脍鱼以相待。”李白此前曾在襄阳干谒过韩朝宗，这位以喜好奖掖后进而著称的权要却冷落了他，所以诗人以东汉末屡遭冷遇的狂士祢衡自比，深感“紫微（拟朝廷）九重，”心中充满了“误学书剑”、“有才无命”的悲哀。同时他也感到一向所希企的“遐登蓬莱”、“挥斥幽愤”的幻想“不可得也”，“金骨未变”（求仙未成）、“玉颜已缙”（年华已逝），但是幽愤

尚在,因此,谈玄赋诗,酣饮沉醉,忘情尘俗。张氏虽为身负王命的朝官,然而此时的李白其所想所为不是隐逸又是什么呢?

李白与簪笏之人的交往有时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并非出于政治目的。比如,天宝后期,李白曾自东鲁寓家之地远游江南,他栖隐于宣城敬亭山下,经常与宣州和宣城的州县两级官员交游。他说“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九日登山》),当时诗人孤身流寓异乡,既无俸禄,又无产业,其经济来源恐怕主要是各类“富贵”友人的馈赠和接济^[3]。

在李白交游中,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物,即贬谪者。他们的身份虽然与隐者不同,但宦海沉浮的不幸遭遇却使其心态往往与隐者非常接近。李白与他们的交游一般都具有浓重的隐逸色彩,何况“赐金放还”以后的诗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贬谪者。这种共同性为他们同事游隐活动提供了心理上的契合点。比如天宝中期,李白离开东鲁有金陵之游,在那里遇故人崔侍御(成甫)。当时,李白以辞君归钓的严子陵自喻(见《酬崔侍御》),而崔成甫自称“我是潇湘放逐臣”(见《赠李十二》),两人同病相怜,志投意合,交游甚密。李白作有《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一首记游诗,诗中李、崔诸人全然超脱出世之狂态,毫无尘俗名利之机心。

李白的金陵之游有一定的特殊性,表面上看,这种身处繁华闹市、纵情酒乐的生活是非常世俗化的,但它却深藏着隐逸内涵。关于隐逸问题,古人早就有一种深刻而辩证的认识。《论语·子路》云:“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晋书·邓粲传》云:“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李白是深谙此理的,他说:“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

(《北山独酌寄韦六》)。可见,隐逸的关键在内容实质(心隐),形式表象(身隐)是次要的。李白的游隐往往具有这个特点。

(三)

李白的隐逸活动又经常是与访道求仙和拜佛参禅的宗教活动相结合的。

道、释本为两教,由于两家以出世为共性,又由于李白既崇道又信佛,而且时常互相交结、难解难分^[4],所以此处合而论之。对于李白的宗教活动尤其是与道教的关系,人们往往也只注意它潜含着政治动机的一面,即把它看成是干谒求仕的另一种手段。这也是不全面的,这与对漫游的偏颇认识一样,都有泛政治化的失误。从理论上说,道、释两派的教义本身都是出世的,因此修道慕仙和奉佛习禅与隐逸活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再从历史上看,道流佛徒中也有一些隐逸之士,修道参禅是他们隐逸的一种特有形式。就李白而言,他的宗教活动固然包含一定的世俗动机和内容,但它也经常具有十分明显的隐逸性质。这就是说,李白的访道求仙和拜佛参禅经常是他隐逸活动的又一种方式。这种隐逸形态,我们不妨把它叫做“道隐”或“佛隐”。由于李白的道隐和佛隐活动有时是互相渗透、交错叠合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统而称之为“宗教之隐”。

李白一生交游的道流人物很多,其中与元丹丘来往最多,关系也最密。大约开元十九年,李白曾来到嵩山之南的颍阳与元丹丘同游,他在《题元丹丘颍阳山居》诗中云:“仙游度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滨。”诗人后来曾追忆这段生活说:“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绿萝笑簪绂,丹壑贱

岩廊”(《闻丹丘子于城北山石门幽居中有高风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赠之》)。由此可见,李白与元丹丘的交游是游隐与道隐的结合,是典型的隐逸活动。又如,天宝十载,李白来到元丹丘在汝州叶县(嵩山之南)新造的石门幽居,再次与之同游共隐。他们曾在一起谈禅论道,李白《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云:“茫茫大梦中,唯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这首诗从题目到正文都很耐人寻味,表面上看它反映了一些矛盾现象:(1)元丹丘本为道士,李白也是游仙者,但他们却来到佛地方城寺做客;(2)他们身在梵宇(青莲宫)却说是谈论道家的“玄”理;(3)明明是以不食酒肉为教规的素食主义者“禅居人”,却“酌玉坐相召;”(4)诗中“茫茫”一联出自道籍,而“腾转”、“灭除”、“澄虑”、“朗悟”几联均来自佛典。上述情况表明,在唐朝佛道两教经常是互相渗透的;而李白既访道求仙又拜佛参禅,他在两家的教义中都找到了出世的理论根据并予以接受,其思想出入仙禅之内,其行为栖隐佛道之间。

李白对道教的崇信皈依,不是止于一般性的读经谈玄、修身养性,而是常常达到心醉沉迷的地步。比如他曾多次从事过炼丹活动,其中在宣州秋浦县清溪一带服勤此事最久。其《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其《宿虾湖》诗也说:“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李白在秋浦盘桓甚久,作诗数十首,其中遁世求仙之句俯拾即是。如:“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清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古风其四》)。诗人不仅有绝尘仙举之思,更有烧鼎炼药之行,这不是标准的道隐生活吗?

(四)

李白隐逸的第三个特点是饮酒与隐逸的结合,可谓之“酒隐”。这个概念本来是诗人的夫子自道,他曾在《秋于敬亭送从侄嵩游庐山序》中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另外,他还说过:“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所谓“酒肆藏名”与“酒隐”意思略同^[5]。

在古代文学史上,喜欢饮酒的作家不计其数,将酒写入作品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不过,如果要论饮酒名气之大,饮酒活动和饮酒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包括隐逸成分)之多,那就不能不说非李白莫属了。

李白基本上是嗜酒终生的,饮酒是他生平中从未间断的一种生活方式。李白自言:“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杜甫说他:“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范碑写他“卧必酒瓮,行惟酒船。”这都非常准确传神地概括出李白生平的一大特点。后世有人甚至说他是“酒星”下凡^[6]。李白不仅酷爱饮酒,而且也特别喜欢把酒写入诗文,李白集中涉及酒的篇什俯拾即是。

对于李白来说,饮酒似乎不只是一种自然生活习惯、一种生理上的嗜好和需求,而往往是“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其饮酒行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寓隐于酒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换句话说,李白的饮酒活动每每折射出隐逸遁世的思想倾向,酣饮沉醉、陶然忘机常常是他隐逸活动的又一特殊形态。如果说江海山林经常是诗人栖身的自然天地,那么,酒趣醉乡就往往是他隐心的精神家园。

李白有一个著名的雅号,叫做“酒仙”。根据杜甫说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一语来看,这个别号最早可能就是出

自诗人自己之口。后来，一位友人曾称李白为“酒仙人”（崔成甫《赠李十二》），而李白又曾自称为“酒仙翁”（《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醉中仙”（《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显然，李白是“酒仙”这一说法在诗人生前即已产生，不仅李白屡以自谓，而且也获得他人的认同。到了后世，这个说法更是屡屡见于文人墨客的笔端，广泛流传于黎民百姓之口，几乎成为一种文化常识。大家知道，魏晋名士沉湎于酒已属司空见惯，甚至嗜酒成癖、成疾；唐代文人饮酒也成为一时风尚，但是喝出一个“酒仙”的大名还是罕见的^[7]，这个“仙”字是值得玩味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含有特定文化信息的符号载体，简而言之，它是道教的一个核心概念。

众所周知，除了“酒仙”外，李白还有“谪仙”与“诗仙”的别称。“诗仙”一说为后起^[8]，并且显然是由前两者演化引申出来的，所以姑置不论。“谪仙”一词出现最早，它很可能就是李白自呼为“酒仙”的直接缘由。“谪仙”的说法是李白与贺知章在长安初次见面时由贺知章说出来的，并且很快传播开来，获得社会上普遍的认同。“谪仙”这个概念主要是包含了道家道教超越尘俗、飘然出世的思想精神。所谓“酒仙”就是酒中神仙，他不仅喜欢酣饮沉醉，而且超越尘俗、飘然出世、陶然忘机。这个雅号含有浓郁的隐逸思想意味。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一下李白的酒隐情况。下面是他的生活片断：“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友人会宿》）此为聚饮。“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独酌》）此为独酌。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沉湎于饮酒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身。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春日醉起言志》）。

更能具体见出其酒隐特征的是组诗《月下独酌四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虽然无知，